

1 本土認同、中國關係與政策 取向：台港民意比較

蕭新煌 尹寶珊 鄭宏泰

引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¹周恩來（1956）提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一中原則」納入序言：「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並於2005年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更為「武統台灣」提供法律依據。²對於香港，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則是：香港是中國的領

-
1. 下文所稱的中國僅指「中國大陸」。
 2. 《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規定：「『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

土，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不平等條約，在條件成熟時將通過談判解決這一歷史遺留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0）。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經過兩年談判終達成協議，簽署《聯合聲明》。1997年，中國政府正式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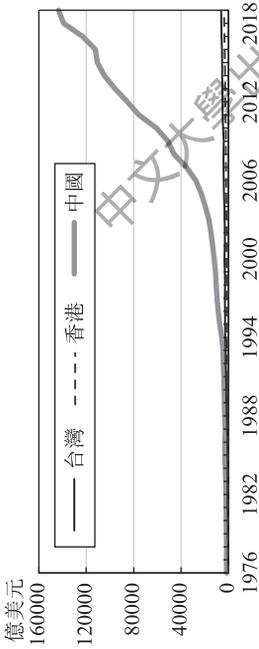
在中國改革開放前，台港社經水平領先於中國，直至2019年，台灣和香港的經濟表現仍勝過很多國家，如本地生產總值各有6,121億和3,657億美元，居全球第21和35位（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21；World Bank, 2021），綜合競爭力位列全球第12和3位（World Economic Forum, 2019:xiii）。然而，在「中國崛起」的趨勢下，台港兩地與中國的連繫顯著加強，彼此的經濟甚至社會生活差距日益縮小，有些地方更高下逆轉（例見圖1和圖2）。

在三地社經政治能力逆轉的形勢下，海峽兩岸以及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難免乍雨乍晴。就兩岸關係而言，和平共處雖是主調，³但中國威脅把台灣邦交國「剃光頭」、運用「以商圍政，以民逼官」以至「以經逼政」戰略，而李登輝提出「特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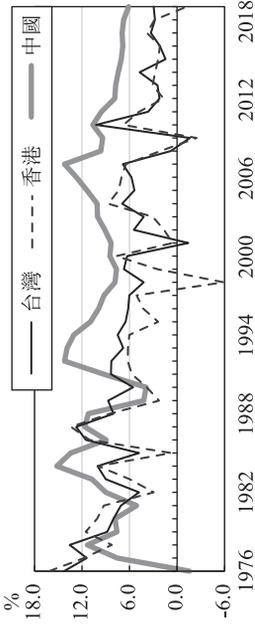
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3. 以經濟為例，開放政策——如台灣從「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戒急用忍」，轉至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曾推動兩岸朝直接和雙向發展，如台資赴陸的核准投資金額由1991年的174.2百萬美元，升至2010年的14,617.9百萬美元；陸資赴台的核准投資金額則由2009年的37.5百萬美元，增至2013年的349.5百萬美元。然而，隨着中國產業結構調整、民進黨執掌政權等政經變化，兩岸關係快速冷卻，如上述投資於2019年各降至4,173.1百萬和97.2百萬美元（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21:表1B, 表16）。

圖 1：台灣、香港和中國的本地生產總值，1976-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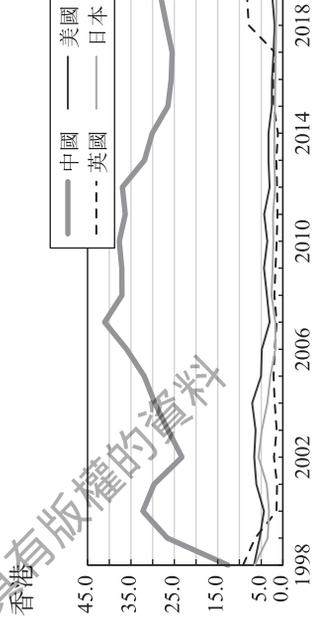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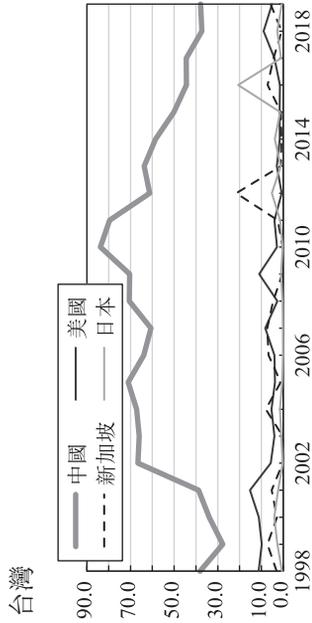


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2021)；World Bank (2021)。

圖 2：台灣的對外投資和香港的外來直接投資，1998-2019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2020)；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21)。

注：從 2013 年起，英屬維爾京群島是香港的最大投資來源地 (約佔 34%)。

國與國關係」、陳水扁推動「一邊一國」、蔡英文拒絕承認「九二共識」等，都令兩岸關係雪上加霜。近年，隨着中美衝突不斷升溫、解放軍在台海進行實戰訓練、習近平重申兩岸問題「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新華網，2019a），而同時台灣的反中意識和內地的民族主義情緒又競相漲升，導致「和平統一」機會渺茫、⁴「武力統一」風險驟增的形勢。

在香港，2014年佔領運動以失敗告終，社會不滿情緒於2019至2020年的反修例運動中大舉爆發。近年的社運參與者傾向勇武抗爭，或在示威場合高舉港英時期旗幟，或在國家認同上倡議「反陸抗中」，主張香港「獨立」，甚至策動「政變」，如戴耀廷（2020）提出「真攞炒十步」，籌劃以一年半的行動，「攞着中共一起跳出懸崖」。⁵結果是未踏至第二步，中國政府就把對港政策重點轉至維護國家安全，包括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⁶和為確保「愛國者治

-
4. 2019年1月，習近平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新華網，2019a）。然而，根據台灣大陸委員會在2020年11月進行的民調結果，拒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台灣民眾高達75.9%（《自由時報》，2020）。
 5. 根據戴耀廷（2020）規劃的時間線，由第一步（2020年7至8月）政府取消民主派人士參選立法會資格，至第六步民主派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第七步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令特區政府停擺、第八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第九步當權者血腥鎮壓香港，最終達到第十步（2022年1月後）西方國家對中共實行政治及經濟制裁，需時一年半成事。
 6. 此法旨在防範、制止和懲治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於2020年6月30日通過並同日起生效，截至2021年2月，共97人被捕，當中八人被起訴（《星島日報》，2021）。

港」而改革政制等，支持香港「獨立」者頓時偃旗息鼓，民主陣營的政治氣氛消沉肅殺。

習近平強調：「民族復興、國家統一是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心所向」，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血濃於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認同，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的！」，不過，他也說：「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但只要台港民眾分享中國發展的機遇，⁷ 深化融合發展（例如提升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通、行業標準共通，推動文化教育和醫療衛生合作、社會保障和公共資源共享等），便能加深相互理解，增進互信認同，實現互利互惠，促進心靈契合，「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美好未來」（新華網，2019a）。

台港兩地民眾是否認同台港與中國真的是「命運共同體」的關係？是否同意個人與中國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又是否相信習近平承諾的「分享發展機遇」、實現互利互惠？本文運用民意調查數據，勾勒在台港與中國關係驟變的政治脈絡下，兩地民眾對本土社會的中國政策取向，並借鑒相關理論和實徵研究成果，探討經濟利害得失、社會前景展望、社會接觸多寡，以及情感認同強弱等四方面的個人因素，⁸ 如何影響本身所傾向支持的中國政策取向。本文的基本假設是：自覺自身家庭和本土社會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愈深、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前景愈樂觀、

7. 如推出「惠台/港」政策，「惠台」政策涉及創業、就業、學習、生活等領域，詳見中國政府於2019年發布的《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新華網，2019b），及各地方政府的落實安排（中國台灣網，2021）。「惠港」政策範圍極廣，用韓正的話是「讓廣大人民群眾看得到、摸得着、享受得到」（大公網，2019）。

8. 下文對理性選擇、社會接觸和情感認同三個理論角度的簡介，部分取自蕭新煌、尹寶珊、鄭宏泰（2018）。

個人與中國的關係愈強，或對本土的認同愈弱的人士，對中國的政策取向也會愈傾向加強合作；反之亦然。

研究方法

資料來源

本文的調查數據取自「2020年中國效應研究」電話調查。調查總體是年滿18歲、家中裝有固網電話的台港居民。台灣調查的訪問地區為台灣地區（含澎湖），以及福建省連江縣與金門縣。

台灣調查於4月21日至5月28日進行。調查採取四階段的機率抽樣：（一）根據2019年人口統計資料計算22個縣市人口數，以等比例原則計算各縣市所需抽取的人數；將各電話局碼依使用量排序累加，以等距抽樣原則於各縣市抽出中選局碼；（二）將各局碼有使用的千位碼依使用量排序累加，以等距抽樣原則於中選局碼抽選千位碼；（三）結合中選局碼與千位碼後，隨機改變末三碼；（四）利用洪氏戶中抽樣法抽取受訪對象。

香港調查於4月15日至5月20日進行。調查採取兩階段的機率抽樣：（一）以最新的住宅電話號碼為抽樣框架，隨機改變末四碼，再隨機抽出號碼；（二）成功接觸住戶後，按「即將生日原則」抽取受訪對象。

台港調查各成功訪問1,234和1,001人。以美國民意研究學會（AAPOR）的回應率公式五（RR5）計算，回應率各為40.7%和34.9%，若將可信度（confidence level）設於95%，抽樣誤差各為 ± 2.8 和 ± 3.1 個百分點以內。兩地受訪者的社經背景簡列於附表1。

分析對象

此次調查，經濟依賴的測量問題只詢問在職、已婚，或

兩者皆是受訪者，未詢問不需回答者（含非已婚且不在職、已婚者及其配偶皆不在職；台港各 187 和 163 人，佔總體的 15.2% 和 16.3%）或其家庭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為保障各變項的可比性，下文的統計分析，僅包括在職、已婚，或兩者皆是的人士。

中國印象與政策取向

「中國崛起」也帶來各式各樣的「中國威脅論」，中國政府於 2007 年把「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列為發展方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7），期能透過多方渠道塑造有利形象，達到改善本國及他國人民對中國的觀感、增強親和力與影響力、「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強國」等目標（新華網，2020）。宣揚國家形象的成敗視乎能否贏得「人心」。因此，不少機構進行跨國調查，以掌握民眾對不同國家的觀感。如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2020）的 2019 年「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在 22 個國家共訪問約 11,000 人，發現逾六成受訪者認為中國國家形象在過去 70 年整體上不斷上升及認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個人、國家、全球治理的積極意義，逾半最期待中國在經濟與科技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然而，Gallup（2021）於 2021 年 2 月的民調結果顯示，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卻降至 20%，創 1979 年開始調查以來的新低。Pew Research Center（2020）於 2020 年 6 至 8 月在 14 個已發展國家進行的民意調查（共訪問 14,276 人）也顯示，大多數民眾對中國持有負面看法，中位數達 73%，最高是日本（86%），最低是意大利（62%）；澳洲、英國、德國、荷蘭、瑞典、美國、南韓、西班牙和加拿大的比例，則是自十多年前展開調查以來的最高點。

我們自 1980 年代起已進行有關台港民眾對中國的觀感和政策取向的民意調查，發現直至近年，兩地民眾對本土與中國的未來關係，抱持相當複雜的態度，包括對本土與中國關係的

整體發展不甚樂觀，傾向與中國保持區隔與疏離的關係，不會全面接受「中國好，台灣／香港也好」的思維（蕭新煌、尹寶珊，1998, 2014; 蕭新煌、尹寶珊、王家英，2008; 蕭新煌等，2018）。

對於民眾的中國政策取向，本文的重點在於探究他們是否有與中國加強合作的意願，選用如下三個指標來測度：

一、「中國關係」中的社會定位。問題是：「有人說：『中國大陸政府是台灣的朋友』，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台），或「您認為內地與香港經濟愈來愈密切，要維護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會容易很多、容易些，困難些，還是困難很多呢？」（港）。受訪者的回應以四分尺度量度（台灣：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同意，4 = 非常同意；香港：1 = 困難很多，2 = 困難些，3 = 容易些，4 = 容易很多），分數愈高代表愈傾向從正面考慮本土與中國的關係，即愈可能支持與中國加強合作。

二、與中國加強經濟融合。問題是：「有人說：『[台灣／香港] 經濟要繼續發展，就一定要靠中國』，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受訪者的回應以四分尺度量度（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同意，4 = 非常同意），分數愈高代表愈傾向認同本土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即愈可能支持與中國加強合作。

三、加強與中國的政治區隔。問題是：「有人說：『如果台灣宣布獨立不會引起戰爭的話，台灣就應該宣布獨立。』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台），或「中央政府強調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您同不同意呢？」（港）。受訪者的回應以四分尺度量度（台灣：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同意，4 = 非常同意；香港：1 = 非常同意，2 = 同意，3 = 不同意，4 = 非常不同意），分數愈低代表愈不傾向認同與中國保持或加強區隔，即愈可能支持與中國加強合作。

表 1：台港民眾的「中國政策」取向：與中國加強合作

	社會定位		經濟融合		政治區隔	
	台灣	香港	台灣	香港	台灣	香港
分布 (%)						
非常同意/容易很多	2.9	2.3	7.8	8.2	34.1	11.1
同意/容易些	19.8	18.1	21.8	34.2	29.9	39.4
不同意/困難些	37.5	45.5	30.5	42.2	17.7	35.9
非常不同意/困難很多	39.8	34.1	39.9	15.4	18.3	13.7
均值 (標準差)	1.86 (0.83)	1.89 (0.78)	1.98 (0.96)	2.35 (0.84)	2.80 (1.10)	2.52 (0.86)
(N)	(1010)	(690)	(1023)	(766)	(983)	(769)

如表 1 所示，在社會定位方面，兩地都只有約兩成民眾從正面和相輔相成的角度理解本土與中國的較全面關係。在台灣，77.3% 的受訪者不同意「中國大陸政府是台灣的朋友」。在香港，79.6% 的受訪者則認為與中國內地加強經濟連繫，會更難維護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在經濟融合方面，兩地民眾尤其台灣都傾向相信本土經濟有能力「獨立」發展，不認同必須依靠中國，持這樣看法的受訪者在兩地各佔 70.4% 和 57.6%。台灣民眾對在經濟領域與中國加強合作的意願，明顯低於香港民眾。

在政治區隔方面，在台灣，同意「如果台灣宣布獨立不會引起戰爭的話，台灣就應該宣布獨立」的受訪者佔 64.0%，接近三分之二的門檻。在香港，對於融入中國國家發展大局，受訪者的取向莫衷一是，50.5% 表示同意，49.6% 卻表示反對。換言之，台灣民眾對在政治領域與中國保持區隔的意願，明顯高於香港民眾。

總言之，調查台港兩地社會定位和政治區隔所用的問題雖

非完全可比，但仍可反映出兩地民眾對中國政策的基本取向，亦即與中國衷誠合作的意願不高；以及與香港相比，台灣民眾對中國懷有更全面和更強烈的警惕心態。

「中國效應」：理性選擇與前景展望

經濟學理論基本建立於行動者是「經濟人」的假設上，即人是追求自利目標、理性選擇方法的決策者（Hirshleifer, 1985:53-54）。此假設已植根於各種社會和政治分析，並發展出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和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等理論，主張行動者基本上是理性自利的，即在行動前會評估形勢，優先考慮自己的利益，衡量可行選擇的利害得失，從而作出效用最大的決定，並形成偏好。

現實生活當然有眾多例子說明人不純粹是「經濟人」或「理性人」，因為行動者未必擁有充分的資訊，或沒有能力細算得失，或受文化規範和社會關係制約，又或僅是基於偏見甚至一時衝動來分析形勢，並作出決定。近年興起的行為經濟學，便認同人的理性、意志力和自利傾向，都有其限度（Mullainathan and Thaler, 2000），轉而兼用社會、認知和情感等因素，來解釋經濟主體的「非自利」和「非理性」決定（Fox, 2015），其中「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的貢獻在於解釋個人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如何根據自己的參考標準評估風險、預期得失和作出決定（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例如面對預期獲利的前景時，行動者多選擇規避風險，但面對可能損失的前景時，則較傾向追求風險（Bendor et al., 2011）。因此，當人們看好本土的社經和政治前景時，會傾向安於現狀，而為了維持現狀或規避風險，會選擇較保守的政策，支持執政者及其盟友；但在看淡前景或面臨威脅時，則傾向尋求改變，接受風險較高的政策變革，支持反對陣營。

「經濟人」假設也常應用於國際關係，甚至民眾對外交

行為的態度。在全球化時代，國家間經常會透過多元渠道增強彼此的經濟、政治，以及社會互動和互賴；然而，國家間的資源與權力分配並不平均，這自然導致不對稱的互賴關係，甚至惡性循環，較常見的例子是主導國透過經濟誘因（如援助、制裁），來增強對接受國的政治影響。以兩岸關係為例，台灣學者便指出，「中國國力提升，台灣也籠罩在其權力資本雙螺旋的輻射之下」（吳介民，2013:11），中國已由文攻武嚇，轉至收攬民心的「以經促統」策略；在近年兩岸關係惡化的情況下，則加上「以經逼統」（Bratton, 2021），例如中國突然暫停台灣鳳梨進口（BBC News 中文，2021b）。民意調查亦證實，兩岸經濟關係發展對台灣民眾自身經濟利益的影響，會左右他們對中國的態度，如自覺受益者對中國的接納程度，便顯著高於自覺受損者或無受益者。過去的調查也出現對中國持正面評價者，會在兩岸交流協商中，傾向選擇經濟利益而非國家主權（陳志柔，2014, 2018）。

香港的相關實徵數據不多。我們曾在 2012 年進行兩項調查，發現對中國居民赴港自由行的正面（包括帶旺消費、改善就業、增進兩地人民互信）和負面（包括帶來更多治安問題、推高商舖租金、推高物價）評價，均對受訪者的自由行政策取向具有顯著的影響。評價愈正面者，愈傾向支持擴大自由行政策；評價愈負面者，則愈傾向支持收緊政策（鄭宏泰、尹寶珊，2014:259）。此外，香港人或其家人在中國投資、工作、上學或居住者，所佔比例不但高近兩成，而且還包括不同的社經背景（蕭新煌、尹寶珊，2014:305）。如果根據理性選擇理論，把這些人歸類為潛在的「中國利益關係人」，就值得觀察究竟他們的自身經濟利益，會否影響他們對中國的政策取向。

本文選用了如下三個指標來衡量台港民眾對「中國效應」的觀感：

一、對本土的經濟效應。問題是：「您認為 [兩岸關係目

前的發展 / 目前內地與香港經濟關係的發展]，對 [台灣 / 香港] 整體經濟的長期發展，是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響？」受訪者的回應以四分尺度量度（1 = 非常壞，2 = 壞，3 = 好，4 = 非常好），分數愈高代表評價愈高。

二、對家庭的經濟效應。問題是：「您認為目前 [兩岸 / 內地與香港] 經濟關係的發展，對您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響？」受訪者的回應以五分尺度量度（1 = 非常壞，2 = 壞，3 = 沒影響，4 = 好，5 = 非常好），⁹ 分數愈高代表評價愈高。

三、對中國的前景展望。問題是：「整體來說，您對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有沒有信心？」受訪者的回應以四分尺度量度（1 = 非常沒信心，2 = 沒信心，3 = 有信心，4 = 非常有信心），分數愈高代表展望愈樂觀。

2020 年，台灣雖與中國陷於政治僵局，但出口中國的貨物總值達 102,454 百萬美元，同比增加 11.6%（中華民國財政部，2021:6），對中國出口依賴度則由 2015 年的 39.0% 上升至 43.8%，規模和佔比均創歷年新高；引起輿論對於本土經濟是否過於「依賴中國」和兩岸經濟應否「脫鉤」等辯論（BBC News 中文，2021a）。而香港在新冠疫情重創之下，經歷了有紀錄以來的最大幅度經濟衰退，失業率急升，經濟下滑再度凸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也有香港專家指出，全球經濟的 K 型復甦和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將為香港經濟帶來新的增長點，而香港恐需要融入中國國家發展大局，才能掌握發展良機（陳蔣輝，2020; 鄂志寰，2021）。

在這樣的形勢下，如表 2 所示，相信目前與中國關係的

9. 原問卷是提供四分尺度，由於回答沒有影響的受訪者比例較多，本文把此等回應歸於壞影響與好影響之間，統稱「沒影響」。

表 2：台港民眾的「中國效應」觀感：經濟效應評估和發展前景展望

	本土經濟效應		家庭經濟效應		前景展望	
	台灣	香港	台灣	香港	台灣	香港
分布 (%)						
非常壞/沒信心	20.0	10.5	6.1	4.5	22.0	9.3
壞/沒信心	42.0	47.5	27.3	33.1	29.7	40.1
沒影響	—	—	39.6	25.1	—	—
好/有信心	31.8	34.1	22.5	33.2	37.1	41.3
非常好/有信心	6.1	7.9	4.5	4.1	11.2	9.2
均值 (標準差)	2.24 (0.84)	2.39 (0.78)	2.92 (0.96)	2.99 (1.00)	2.38 (0.95)	2.50 (0.79)
(N)	(978)	(724)	(1018)	(740)	(944)	(750)

發展有助本土經濟長期發展的台港民眾只有四成上下（37.9%和 42.0%）；相信有助改善自身家庭經濟者更少（27.0%和 37.3%）。換言之，台港民眾對中國經濟效應的評價是同中有異：相同之處見於雙方的評價都略傾向負面；相異之處則是台灣民眾的社會和個人層面評價，都更低於香港民眾。

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台港民眾的評估都可算是好壞參半。在台灣，看好中國前景者佔 48.3%，缺乏信心者佔 51.7%；香港的相關比例則是 50.5% 和 49.4%。

由此可見，台港民眾對「中國效應」的觀感，都未形成明確的共識，在面對相關議題、權衡利害和取捨政策時，容易激發社會矛盾，甚至對峙的局面。

「中國關係」：社會接觸與經濟依賴

在種族隔離時期的美國，Allport (1954) 提出了影響深遠

的「群際接觸假設」，即在適當的條件下，群體成員間的接觸能有效減少群際偏見和衝突，改善社會關係。嗣後，社會接觸理論和研究均取得重大發展（Hewstone and Swart, 2011），研究對象拓展至各式各樣的群體、接觸條件、社會結構和文化規範，以闡釋直接、非直接，以至想像的接觸是否、何時、如何、在哪些層面產生正面效益等問題。儘管過去數十年的實徵研究並未提供一致的結果，但根據 Pettigrew 和 Tropp（2006）對 38 個國家共 515 項相關研究的統合分析，群際接觸對減少偏見還是普遍具有正面作用。而群際接觸更能有效促進互相認識和了解、提升容忍和接納異己的能力，這已成為不少國家和國際組織制訂政策時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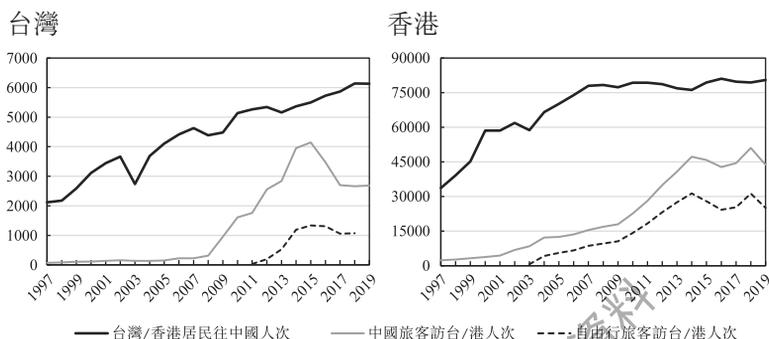
台灣和中國自 1949 年起分裂分治，兩岸對峙直至 1980 年代始有所鬆動。台灣於 1987 年批准民眾赴中國探親，1993 年施行《台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一般民眾赴中國不再受事由限制；海基會與海協會亦於 2008 年簽署和實施《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放寬中國人民赴台觀光，¹⁰ 直至 2019 年始因兩岸關係惡化而停發「個人旅遊簽注」。

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則截然不同，香港雖經歷百多年殖民統治，但由於缺乏天然資源，不能自給自足，門戶開放、市場自由是發展的基石，香港與中國密不可分的社經關係，僅在 1950 至 1970 年代陷於中止。然而，開放後前 20 多年，兩地居民的流動基本上是香港人大量進出中國、中國人極少進出香港的單向格局，直至 2003 年推出自由行政策，才扭轉兩地交往的態勢。

圖 3 顯示 1997 至 2019 年台港與中國民眾跨境往來的模式和變化。我們首先可見，台灣民眾往中國從 212 萬人次增至 613 萬人次；與此同時，中國民眾訪台更從 7 萬人次升至 268

10. 初期每天以 3,000 人次為限、採「團進團出」形式、停留期上限為 10 天；其後不斷放寬條件，包括於 2011 年開放個人遊。

圖 3：台灣、香港與中國居民跨境往來的趨勢，1997–2019
(千人次)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歷年, 2018a, 2019a, 2020a）；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歷年）；香港政府統計處（2002:201）；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2007, 2014, 2021）；香港旅遊發展局（2020:8–9）。

萬人次，佔 2019 年訪台旅客總數的 22.6%（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 2020）。其次，香港民眾往中國的人次一直大幅高於中國民眾來港，但差距明顯減少：前者由 3,368 萬人次增至 8,050 萬人次，後者由 236 萬人次增至 4,377 萬人次；兩者比例由 14.3 倍下降至 1.8 倍，雙向交往不斷擴大。

然而，雙邊民眾增加接觸，反暴露了彼此因生活方式及政治社會價值觀差異的潛在矛盾，甚至引發各種意料之外的社會問題與政治紛爭，例如香港的「雙非嬰兒」數量飆升，導致產婦床位荒和小學學位荒等民生困擾；又如水貨客急增，掀起連串「蝗蟲論」、「100 萬人反對再擴大自由行」等歧視性言論和集體行動。歐洲在 2015 年爆發難民危機，同樣引發不少難民接收國對安全的恐懼，掀起廣泛的排外、仇外和反移民的民粹情緒，極右勢力迅速壯大。台港與中國民眾的社會接觸又是否有助兩地融合，實為兼具學術理論和公共政策意義的課題。根據前述的 2012 年香港調查，在社經背景相若的情況下，與中

國民眾接觸愈頻密，對自由行的正面評價愈高（鄭宏泰、尹寶珊，2014:258）；同年另一調查亦發現，認識現居中國的香港人愈多，也愈傾向支持香港與中國加強融合（蕭新煌、尹寶珊，2014:312）。

本文選用了如下三個指標來衡量台港民眾在私領域的「中國關係」強度：

一、與中國的社會接觸。台港民眾可透過訪台 / 港旅客，以及造訪中國與中國民眾交往接觸，鑒於相關研究發現非自願的群際接觸（尤其相信對方會威脅或損害己方的利益時），反而會加深成見，釀成更嚴重的矛盾（Techakesari et al., 2015），故此我們選用造訪中國來測量台港民眾與中國的社會接觸，問題是：「您在 2019 年有沒有去過中國大陸？如果有，去過幾次？」我們把回答「從來沒有」（台） / 「沒有」（港）給予 1 分，歸為「弱接觸」；回答「去年沒有」（台） / 「1-2 次」（港）給予 2 分，歸為「中度接觸」；回答「1 次」（台） / 「3 次及以上」（港）給予 3 分，¹¹ 歸為「強接觸」；分數愈高代表接觸愈多，即與中國的關係愈強。

二、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問題是：「請問中國大陸市場（包含訪 [台 / 港] 旅客）對您或您配偶目前的工作重不重要？」受訪者的回應以四分尺度量度（1 = 非常不重要，2 = 不重要，3 = 重要，4 = 非常重要），分數愈高代表依賴愈深，即與中國的關係愈強。

三、與中國加強關係。問題是：「如果有機會，您願不願意鼓勵您的家人去中國大陸發展，包括就學、投資和工作？」受訪者的回應以四分尺度量度（1 = 非常不願意，2 = 不願意，

11. 在香港，回答「忘記在 2019 去中國大陸的次數」者被編為「3 次及以上」。

表 3：台港民眾的「中國關係」強度：社會接觸經驗、經濟依賴評估和加強關係意願

	社會接觸		經濟依賴		加強關係	
	台灣	香港	台灣	香港	台灣	香港
分布 (%)						
弱接觸/非常弱	44.3	37.5	41.8	13.4	40.2	29.1
中度接觸/弱	42.9	22.3	38.8	53.9	29.5	36.9
強接觸/強	12.8	40.2	10.5	25.2	21.8	27.7
非常強	—	—	8.9	7.4	8.5	6.3
均值 (標準差)	1.68 (0.69)	2.03 (0.88)	1.87 (0.93)	2.27 (0.78)	1.99 (0.98)	2.11 (0.90)
(N)	(1047)	(838)	(891)	(662)	(1014)	(697)

3 = 願意, 4 = 非常願意),¹² 分數愈高代表意願愈高, 即與中國的關係愈強。

如表 3 所示, 在社會接觸方面, 無論是台灣或香港, 與中國保持頻密接觸者都不屬多數。在台灣, 可歸為弱接觸、中度接觸和強接觸的受訪者比例為 44.3%、42.9% 和 12.8%; 香港的比例則為 37.5%、22.3% 和 40.2%。由此可見, 就親身造訪中國的經驗而言, 台港均有約四成受訪者維持弱的「中國關係」(44.3% 和 37.5%), 但在強的「中國關係」上, 兩地則呈現非常分明的差別 (12.8% 和 40.2%)。

在經濟依賴方面, 台灣民眾的評估則是顯著低於香港, 表示中國市場對自己或配偶目前的工作非常重要的台港受訪者比例為 41.8% 和 13.4%, 認為不重要者佔 38.8% 和 53.9%; 持

12. 在香港的迴歸分析中, 回答「不知道」者被編為 2.5 分。

相反評估即自覺重要或非常重要的比例則為 19.4% 和 32.6%。雖則如此，就經濟依賴的自我評估而言，台港同樣以弱或非常弱的「中國關係」者居大多數。

在加強關係方面，台灣民眾的意願又低於香港，表示非常不願意鼓勵家人去中國發展者，台港各佔 40.2% 和 29.1%，回答不願意者各佔 29.5% 和 36.9%；意向相反即表示願意或非常願意的比例（30.3% 和 34.0%），則相差不遠。就家庭層面與中國加強關係的意願而言，台港也以弱或非常弱的「中國關係」者居多。

總括而言，無論是社會接觸、經濟依賴或加強關係，台港民眾在私領域的「中國關係」強度均明顯偏低。相比之下，香港民眾在這三方面的強度比較一致，台灣民眾則是加強關係意願，高於經濟依賴評估和社會接觸經驗。

「本土認同」：情感與國族認同

經濟學和理性選擇學派雖認同性自利動機只能解釋部分的社經和政治行為，但研究重點仍是行動者的物質需求和利益考量。相對於較易受外在因素影響、較易變動的經濟因素，建基於象徵互動論的認同理論，與建基於社會分類的社會認同理論，則聚焦於透過社教化過程凝聚而較難改變的情感因素，這包括個人置身於團體的社會認知過程、非物質動機，以及「我群」和「他群」意識對群際關係的影響等（Stets and Burke, 2000; Wimmer, 2013）。情感認同對個人社經和政治行為的影響，取得眾多實徵研究的支持。

在眾多的身分認同中，國族是相當根本的集體認同對象，人民對國族的歸屬感、忠誠感、責任感和光榮感，是國家穩定、團結與發展，以至文化傳承的基石。然而，國族認同也可孕育刻板印象和偏見，導致「我群」和「他群」的對立，以至